

邓小平的“拿来为我所用” 与张之洞的“西学为用”

——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

武昌造船厂经济思想史组

湖北财专经济研究室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党中央两项决议的鼓舞下，掀起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邓小平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所鼓吹的洋奴哲学，就是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邓小平的这一套同历史上的洋务派，完全是一脉相承，一路货色。追溯历史根源，找出某些具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对深刻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和深入批判他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十分必要的。

洋奴哲学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过程中，伴随洋务运动形成的一种地主买办阶级的意识形态。毛主席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也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我国近代史上出现的第一批当权的洋奴。他们以“自强”、“求富”为幌子，出卖国家主权，大办“洋务”。所谓洋务运动，就是依靠外国侵略者镇压国内革命、挽救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所谓自救运动，是出卖民族利益、对外妥协投降的卖国运动。洋务派和它所鼓吹的洋奴哲学正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

张之洞是后起的洋务派头目。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清政府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小朝廷。适应这一历史特点，张之洞把洋务派的反动主张进一步“理论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性口号，散布了一系列的崇洋迷外的反动谬论。所谓“中学为体”，就是把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封建制度的“三纲、四维”作为万古不移的根本；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学洋人的技术，借洋人的资本，用洋人的办法，开办企业、学校，编练军队，以加强清王朝的统治力量。这个纲领集中反映了洋务派的封建性、买办性，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结成了反动同盟，道破了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

张之洞作为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敌视人民群众，另一方面一切依赖外国。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似乎离开了“洋大人”就一事无成。为

了推行一条崇洋迷外的办企业路线，他炮制了一系列卖国“有理”的谬论。一曰“借债无害论”。他说由于“财源枯竭”，缺乏资金，就必须借外债，只要“权限清”，就“无害”。借贷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是帝国主义用以控制借款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怎么能“权限清”而“无害”呢？张之洞为修京汉铁路、兴办某些企业的多次借款，都附有出卖主权的条件。二曰“外国投资有利论”。他主张外国直接在华设厂，或与华商合股经营，说这些对中国都有“利”。这是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掠夺中国原料，榨取中国廉价劳动力，垄断中国市场，大开方便之门。三曰“买洋机器应急论”。他说机器、材料“中国工厂未备”，自己造不了，只有“购之外洋以应急”。无论修铁路、建工厂，以及其他建筑所需的器材，都需从外国买来。他所兴办的洋务，正是这样做的。照这一谬论办理，只能是永远依赖外国，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四曰“技术算理精微，必资外洋论”。张之洞吹捧外国生产技术复杂、“算理精微”，对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技术不敢深信”，不能“学制”外国的机器设备等产品。因此，不仅要多买外国产品，而且要请“洋工师”、“洋匠”来中国“指挥”生产，对他们要“听其主持，不掣其肘”。这就清楚地说明他把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大权奉送给帝国主义。这样，哪还有经济独立！

张之洞的“西学为用”是十足的洋奴哲学，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卖国投降路线。洋务运动的失败，并没有使洋奴哲学销声匿迹。相反，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随着封建、买办资产阶级更加投靠帝国主义，洋奴哲学也越来越恶性发展，成为旧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的重要统治思想，中国人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推行崇洋迷外、依赖外国的方针，这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主席这条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它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群众的智慧，战胜了一个个困难，攀登了一座座高峰，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造卫星的讯号声、远洋巨轮的汽笛声、石油钻机的旋转声、电子设备的操作声交织成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响彻寰宇。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在二十几年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大唱反调。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伙同刘少奇鼓吹洋奴哲学，妄图重走“洋务派”的老路。他们贩卖什么“外援决定论”、“红色买办论”，推行崇洋迷外的办企业路线。这种洋奴哲学与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广大革命群众批得体无完肤，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邓小平也假惺惺地“承认”自己是“最大的走资派”，并宣称：“永不翻案”。可是他一旦重新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就刮起了右倾翻案风，妄图卷土重来，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路线。他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幌子下，再次宣扬“不管白猫、黑猫”的主张，大搞洋奴哲学。他在多次讲话和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公然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主张中国的生产发展、科学技术要立足于学习外国，靠引进外国的东西。他诬蔑我们“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说什么“必须虚心地向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生产上应“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科学技术上要“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他把这种立足于仰赖外国的洋奴思想，美其名曰“拿来为我所用”。在他看来，只要按他这一套方法办，外国的“好东西”就一下子“为我所有”，似乎他那个“四个现代化”就能很快实现。邓小平这个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旗帜下贩卖的“拿来为我所用”，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实质上是张之洞“西学为用”的翻版。

同张之洞一样，邓小平贩卖“拿来为我所用”的手法，也是先把中国的现状说成是一切落后，把外国描绘为样样先进。他别有用心地片面强调中国“很穷、很落后”，不仅生产上技术是“落后的”，科学研究上也不如人，谈不上攀登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是问题”；一谈到外国，这是“最新最好的”，那是“先进的优良的”，外国的“效率”比中国高，外国有“高、精、尖”。依他看来，出路只有一条，匍匐在“洋大人”脚下，把外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怎样“拿来”呢？他的办法是：“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这是“买”；“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由外国提供资本、设备，“用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偿还”，这是“借”。为了掩盖这种崇洋迷外的实质，他制造了种种荒唐的论据，说什么“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延期付款，分期付款是“国际贸易中”的“通行作法”，“这不同于欠外债”等。真是欲盖弥彰，和张之洞为外国资本输出张目的论据如出一辙，他们的逻辑是：“凡是外国有的，都是对的”！

按照邓小平的这个“拿来为我所用”的洋奴哲学，中国将走向何方？这是必须予以分析和回答的问题，也是我们和邓小平的根本分歧所在。因为问题不是搞不搞“四个现代化”，而是立足于什么基点上，怎么“化”；是“化”向资本主义，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且看邓小平是怎样“化”的，“化”向何方？

在生产上，按照邓小平“买”的办法，就是中国只生产过时的机器、设备，加工初级产品；先进的设备一律由外国引进。为了去换回这些“先进”的洋设备、洋技术，中国的很大一部分生产就要依据外国的需要、资本主义市场的行情来安排；按照他的“借”的办法，更有一部分生产在“长期合同”的制约下，完全失去自主权，生产的产品只能用于“抵偿”外国垄断集团的债务，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子公司”——为其提供原料、燃料、初级产品的附属厂矿。这样，中国自己可以生产的，却无限制地进口；自己十分需要的，又在换回洋设备、洋技术的“需要”下拼命地出口。由于在这种办法下，中国的产品变成了“一剖开好多东西”是外国的，直接依存于进口部件、设备；由于中国的许多产品是直接为资本主义市场生产，并有一部分完全供应某些垄断资本集团，实际上也就是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样，不仅我国在经济上必然受制于资本主义大国，而且必然受到动荡的资本主义市场供求、价格的影响，受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哪里是什么加速“四个现代化”，而是要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

掠夺原料、初级品，销售商品的基地和场所，重新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邓小平引以为“据”的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现象，本来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垄断资本相互渗透的结果。但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能完全依赖外国，否则难免受人控制，经不起国际上的风吹草动和供求上的急剧变化。邓小平把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病态现象居然当成合理的例证，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他要把中国“化”向何方，不是不说自明了吗！还应当指出，我们所说的外援为辅，是体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援的一种关系，这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买卖关系是性质不同的。对外国资本家来说是为了赚钱，根本不是什么支援。所以，妄图以我们不拒绝外援为幌子推销洋奴哲学是徒劳的。当然，我们也并非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根据我们的需要与可能，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出口一些工、农产品，引进一些技术或设备是必要的，但和完全寄托于外国并把生产从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办法是本质不同的。

在科学技术上，邓小平叫嚷“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实际的意思是：凡是外国未研究的，未制造的，中国就不能研究、制造；凡是外国的成品，就只能引进、仿制，不能“改动”。也就是中国人只能走外国技术发展的老路，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爬行。这条道路意味着什么呢？不管邓小平把资本主义外国吹捧的多么先进，我们作为不同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需要，绝对不能无批判地、无区别地一律照搬。外国的“高、精、尖”未必都是先进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适应资本主义需要的特点，难以完全符合于我们工、农业发展的情况和需要；我们也不能在自己迫切需要时，因为外国没有搞就缚住自己手脚不做。如果按邓小平那套主张，凡是外国人在科学技术上未解决的课题，中国人就自愧不如、不敢尝试，又怎能实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宏伟前景，这倒确是只登“中峰”、“低峰”。可见，邓小平的“拿来为我所用”并不是什么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锦囊妙计，而是束缚中国人手脚的精神枷锁。

总之，邓小平的这种“拿来为我所用”是立足于仰赖外国，不加批判、一律照搬的奴隶主义，与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有分析、有区别地借鉴某些外国经验的“洋为中用”毫无共同之处。邓小平假借“为我所用”之名行崇洋迷外之实，是张之洞以“西学为用”推销洋奴哲学的手法的重演。

邓小平如此宣扬洋奴哲学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与近百年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所奉行的崇洋迷外路线，有着先后嬗替的血缘关系。

他作为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与历史上所有反动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都是敌视劳动群众，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的奇迹，取得的硕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拜倒在洋权威、洋技术的脚下。他把劳动群众看作无知的群氓，诬蔑工人阶级“在科学技术上只能跟着搞”，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这种敌视人民群众，崇拜洋权威的反动观点由来已久，还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美化在外国留过学的资本家比工人阶级“有本领”，是“艰苦奋斗出来的”。在中国劳动人民面前以“救世主”自居，在外国资产阶级脚下却变成侏儒，这就是他必然宣扬洋奴哲学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与张之洞相距近百年,为什么两人贩卖的洋奴哲学如此一脉相承?列宁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洋奴哲学作为买办阶级尸体上孳生的毒菌,又在党内资产阶级那里找到了温床。邓小平这个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在中国历史上,买办资产阶级从来都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宣扬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先天的软弱性,他们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但在经济上又有依赖帝国主义的一面,既怕帝国主义,又常常搞崇洋迷外。邓小平继承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他与地主买办阶级在宣扬洋奴哲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统一性”,于是张之洞的“西学为用”在邓小平的“拿来为我所用”上借尸还魂。

我们从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追溯清末的洋务派头目张之洞,对比他们贩卖洋奴哲学的谬论、手法,剖析他们的思想和阶级根源,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或复辟旧制度,惧怕革命触动和破坏了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统治权利,总是以“发展生产”为名掩盖其存亡继绝的反动本质。为了掩人耳目,往往打出冠冕堂皇的旗号,什么“自强”、“求富”、“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都是这类货色。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反动阶级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旧制度总是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所以,在“发展生产”的幌子下搞洋奴哲学,用以维护旧制度,就成为他们的共性之一。

宣扬洋奴哲学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推销私货都采用散布民族虚无主义的手法去实行民族投降主义。他们总是丑化中国,美化外国,把中国诬蔑为一切落后,把外国吹捧成一切先进。在他们的心目中,外国的东西美好无瑕,外国的经验是至理名言,外国的“事物”就是他们辨别是非的标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人是低等民族,中国人只能仿行,不能创造。总之,“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就是洋奴哲学的维妙维肖的写照。

宣扬崇洋迷外的人都是唯心史观的信奉者,敌视和不相信人民群众,是一切剥削阶级的特点,也是他们搞洋奴哲学的一个思想根源。无视中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崇拜外国的权威、专家,是这些人共同的特点。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的精神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它的影响存在,洋奴哲学就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市场,搞崇洋迷外也必然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清除这一思想的流毒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

在当前,彻底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用坚持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